

孙子兵法

壹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

貳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

叁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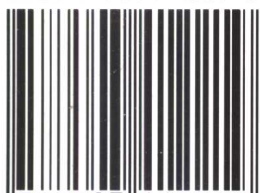
肆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正

封面设计：荣容

ISBN 7-5034-1221-6



9 787503 412219 >

ISBN 7-5034-1221-6/K · 0843

定价：980.00 元（全四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孙子兵法

本书编委会编写

(一)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

本书编委会编写

(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

本书编委会编写

(三)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

本书编委会编写

(四)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兵法/王建民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1

ISBN 7-5034-1221-6

I. 孙… II. 王… III. ①孙子兵法—注释②孙子兵法—译文 IV. 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735 号

孙 子 兵 法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 108.125 印张:250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980.00 元(全四册)

ISBN 7-5034-1221-6/K·0843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孙子兵法》编委会

主 编：	王建民	萧 枫		
副 主 编：	徐丽君	许桂珍	尚书志	王 彤
编 委：	赵善民	齐学义	孙永富	唐日新
	于 游	蒋亚军	谢保宁	张 明
	张一峰	黄志钢	张勇刚	于久洪
	王建伟	仲雄杰	房凤鸣	赵红霞
	郭子波	周成武	盛恩泽	黄修俊
	王风雨	怀兴凯	杨秋成	鲁佑明
编撰成员：	孙家俊	朱少华	过亦林	吴 穹
	汪 彦	陈学建	苏 虹	苏 静
	杨一民	沈永宏	张国浩	周正舒
	唐志龙	唐彦生	暴淑艳	胡东明
	刘振东	王继全	崔光东	郭子义
	李风云	王东升	李圣利	田 林
	李世伟	潘志刚	刘全保	崔润田
	胡志杰	张建明	刘志杰	魏明亮
	魏凤山	宁大川	李继勋	孙 蒙
	马继超	王文功	刘 建	赵世平
	王建华	李宽全	崔志海	闻 海
	金志萍	高明宇	马文明	王建民

徐丽君	许桂珍	黄志勇	王树云
季蓬茂	吴振良	杜晓莉	史树更
高树春	李广建	王甫云	张翔明
李建平	黄志铜	张一峰	丁 海
王华彬	王显聰	张 毅	张殿华
黄修俊	尚书志	盛东升	张凤杰
高晓路	叶利萍	叶利健	张善轩
吕 达	季胜荣	张勇刚	姜 丰
全晓刚	李鹏飞	庞有涛	陈洪涛
吴国江	李 韧	于 岩	刘 坚
王庆成	毛瑞杰	王福斌	高 瑞
苏云平	赵道文	王建伟	孟繁文
仲雄杰	房凤鸣	赵红霞	郭子波
周成武	盛恩泽	徐 宏	杨士军
别永富	于久红	张劲松	李 季
郇六六	钱彬堂	郝德恩	鲁佑明
赵善民	齐学义	唐日新	王风雨

毛泽东与《孙子兵法》

廖盖隆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其军事理论成就和战争指挥才能是举世公认的。他的军事理论当然主要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和哲学，是来自其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是在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军事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汲取并改造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精华，借鉴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实践经验，以丰富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中国古代军事经典《孙子兵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孙子兵法》系春秋末年孙武所著，共13篇约6000余字，因此又称为《孙子十三篇》。这13篇是：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内容博大精深，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作为最重要的军事教材而流传至今。书中一些基本的战略战术思想，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等，都不失为真理性的认识。诚如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它堪称是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于生命力的一部。

毛泽东研读《孙子兵法》究竟起于何时呢？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1914年他写的《讲堂录》中有读魏源《孙子集注序》的多条笔记。其中就含有孙子语录。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兵势篇》）魏源的序言认为《周易》、《老子》都是“言兵之书”，而《孙子》则是“言道之书”。魏源抓住这三部书的共同点，指出：“夫经之《易经》也，子之《老子》也，兵家之《孙子》也，其道旨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会无人，综常变者也。”这是相当独到的见解。它表明军事理论可以上升到哲学高度，哲学理论也可以实用于军事战略。毛泽东晚年提出“老子是一部兵

08/07/01

书”，这种观点可能是早年读《孙子集注》时就已萌发。

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已熟读《易经》、《老子》，而未及《孙子》，待到后来上山打游击，又很难找到《孙子》这本书。但他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经验，有许多地方与《孙子》不谋而合。“左”倾教条主义者便想当然地指责他是靠《孙子兵法》来指挥作战的。直到长征过后，他才有机会真正读到《孙子兵法》。1936年他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便多处引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诸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避其锐气，击其精归”；《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等。他并不是简单地袭取其词语，而是深入地领会其精神，多方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与古代兵家的权谋韬略互相印证与发明，使之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战争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必然有其客观规律。认识并运用这些客观规律，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战争中的认识论问题。我国古代著名兵家，从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尤以《孙子兵法》对这一问题论述得比较深刻。《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强调：“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这里的“战道”或“道”，既指战争的客观规律，又指依据战争固有的客观规律来指导战争，即可不受国君的命令所左右，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如何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孙子兵法·地形篇》提出了“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命题。所谓“彼”、“己”是指作战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所谓“天”、“地”则是指作战时的天时、地利等方面的自然条件。孙武对这些方面的情况，还作了详尽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如在《计篇》中，提出了“五事”、“七计”。所谓“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所谓“七计”，“曰：主就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里，他从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等5个方面，把敌我双方优劣条件作比较，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具体来说，从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哪一方将帅的指挥才能高超，哪一方天时地利有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军事实力较为强大，哪一方的兵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严明等7项估计，来作出战争谁胜谁负的判断。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兵书深有研究。他的军事哲学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兵书中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别的任何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

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尽管战争这一社会现象更带有偶然性的特点，但它仍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运动，不仅有其本身的规律，而且这一规律是可知的，即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曾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去规律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所谓学习阶段，也就是知的阶段，即认识客观实际，由物质到精神，由实践到认识的阶段。当达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时，就完成了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在这一阶段中，人们研究和认识的对象，是战争的敌我双方，因而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都应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使用阶段，也就是行的阶段，即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的敌人。这就是由精神到物质，由认识到实践的阶段。按照这些规律所制订的作战方案、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从而战胜了当前敌人，这就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在这一阶段中，当然也涉及到战争中敌我双方。任何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片面性，都绝不可能按照客观的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对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专著中，又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在《矛盾论》一书中，他引用了《水浒传》里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事例，来印证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未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和活动规律，因判断错误、方法不对而打了败仗。后来从调查情况入手，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祝家庄与扈家庄、李家庄的军事联盟，用了同西方历史上特洛伊木马计类似的方法，在敌人营盘里埋下了伏兵，里应外合，终于在第三次打了胜仗。通过这一生动的例证，使这个命题的含意，比在《孙子兵法》中本来的含意更加丰富，更为深刻了。

毛泽东不仅重视对一般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尤其重视对特殊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中，就首先着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具体分析说，对一般的战争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都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对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而对于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

的规律，则更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为此，他批判了那种只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而不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或只研究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殊的战争规律，而不研究中国现时的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等错误倾向。指出在研究战争指导规律时，“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毛泽东的这篇军事著作，正是在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侧重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进行系统、深刻的阐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前者在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者则在科学总结抗日战争以来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特殊规律。

《孙子兵法》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奇者，指多变的作战形式；正者，指阵地战的正规作战形式。毛泽东吸取了“奇正相生”的策略思想，并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使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相互渗透、互相转化，其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认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并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后来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争实力已大大增强。因此，毛泽东提倡大规模的运动战，结合开展阵地战，逐步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但是各个阶段和各个战场上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就决定着战略和战术的特殊性。如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前后，东北和华北我军正以大规模运动战的方式，开始战略性的反攻，但西北战场却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和带游击性的“蘑菇”战术。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些说明毛泽东吸收了《孙子兵法》的“奇正相生”思想，善于根据战争实力的变化，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灵活地加以运用。

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手段，防御则是

为了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也是为了消灭敌人。《孙子兵法》对保存自己的防御性战略颇为称述，其言曰：“避其锐气，击其精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广泛征引我国古代战例，来阐明这种积极防御的思想。他首先讲述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生动地阐明退却与进攻的辩证关系。继而又全文征引《左传》有关齐鲁长勺之战的记述，并从战略高度加以概括。他说：“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他剖析了“曹刿论战”的内容，揭示了三条经验：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论析层层深入，突出了积极防御的意义。接着，他又联系而及历史上的许多战例：“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由此可见，他创导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确是厚积而薄发，建立在钻研中国古代战例的基础之上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再一次回顾了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又加上晋楚城濮之战、韩信被赵之战两例。并着重指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可见，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的防御性战略结合中国古代战例的钻研与其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形成有着内在联系。

《孙子兵法》说：“弱先于强”，“强弱形也”，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要在战略全局上，将敌强我弱变成敌弱我强，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而在局部上，即在战役或战斗上造成敌弱我强的态势，则是通过正确的指挥，可望争取实现的。因此，为了创造转弱为强的有利形势，孙子还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就是说，在战役和战斗中，要注意防止我之兵力分散，而要造成敌之兵力分散，力争集中五倍乃至十倍于敌之兵力，形成拳头，以众击寡；如情况相反，则应“逃之”、“避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显然，这里继承了孙子的“十则围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